

参考文献:

- 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 1989 年第 4 期
- 马戎, 1989, “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 《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 马戎(编), 1997,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马戎, 2001, 《民族与社会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马戎, 2004: “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 第一辑
- 陈建懋, 2003: “多元一体: 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作者为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03 硕士研究生)

【论文转载】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李治亭

[摘要]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 自春秋以来的 2300 余年间, 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 相沿未革, 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 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 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 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关键词] 华夷之辨; 北方; 民族观念; 大一统

民族“大一统”的观念, 是清代民族政策、观念的重要变革之一。它从根本上破除了“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并在政治实践中也改变了秦汉以来“华夷分治”的传统政策, 最终实现了多民族空前“大一统”的治国目标。

一、清以前“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所谓“华夷之辨”, 简单地说, 就是从文化上严格区分华夏(汉族)与夷狄(少数民族)“内诸夏而外夷狄”, 主张内外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思想观念源于春秋时期儒家的政治主张, 当时, 礼崩乐坏, 孔子力主尊周王, 复周礼, 对外攘却夷狄, 使之不能变易周礼即“诸夏”的文化。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 最清楚地表述了“华夷之辨”的基本观念。春秋时期的这一民族观, 一直延续下来, 并伴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内向”侵扰而得到加强。

秦始皇为防御匈奴, 筑万里长城, 将“华夷之辨”的观念付诸政治实践, 使之具体化。如西汉人说: “秦始皇攘却戎狄, 筑长城, 界中国。”[1] 又有东汉人说: “天设山河, 秦筑长城, 所以



别内外，异殊俗也。”[2] 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就成了“中国”与夷狄的分界线。于是，又有了“内中国外夷狄”之说。所谓“内外”、“中外”、“华夷”或直言“中国”与夷狄之分，都是以长城为限隔的。自秦始，迄至清以前，二千年间，大多数王朝都修长城不止（惟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不修），坚守长城这道藩篱，贯彻“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和政策，将“三北”广大地区的游牧及渔猎民族隔离在长城以外。

中国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汉人所建王朝，一贯歧视、防备“夷狄”等少数民族。晋人公开宣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 显然，夷狄为“异民族”，与汉人非为一族，不能同心，理应被排斥在汉族之外。明朝统治集团更是极力鼓吹“华夷大分”论，坚主华必统夷，而夷决不可干“中国”之统。这即是说，华人是天然的统治者，而夷狄必受华人统治。因此，对夷狄等少数民族“严华夷之防”，已成为世代相沿的一项传统政策，以对夷狄之“大防”为其治国和统治夷狄的大计。

在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的民族观念指导下，在清以前，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好“三北”地区的民族问题，故其“边患”、“外患”不断，战争不息。检诸史册，自秦始，经两汉、魏晋，传至隋、唐、宋、辽、金、元，直至明代，都留下了与“三北”诸民族战争的难以计数的记录。诸如匈奴、东胡、鲜卑、羌、突厥、回纥、党项、氏、高句丽、契丹、女真、蒙古、乌桓、琳羯、满等，先后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与中原王朝相抗衡，各自建立政权，或一统天下，或得江山半壁，或建地方割据政权。历史证明，欲真正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关键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北”地区的民族统一问题。而实现这一政治目标，首先要破除传统的民族观念。“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无疑是中国“大一统”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清代“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

“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其本质是排他的，即视“夷狄”等少数民族为“异民族”而加以排斥。当然，夷狄诸民族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原王朝，但从民族文化、民族感情上却不被容纳。与此相反，清朝提出并实践一种新型的民族观，我们把它概括为“民族大一统”。

“大一统”是儒家提出的政治主张，《礼记》给予最通俗的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统之义也。”可见，“大一统”之本义，要求天下统于一个政权，而一个政权统于一主。这就是“以一治之”之意。与“统一”相反，就是分裂、割据，历来为儒家所反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大一统”的理论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却大受“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大一统”的政治实践亦大受局限，因而迟至清以前始终没有解决好边疆主要是“三北”地区的民族问题，即尚未真正实现各民族“大一统”。

清朝提出并实践的“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内涵十分丰富，要而言之：清朝包容不同的民族，视各民族为一个整体，都是清朝管辖的一部分。这就是说，生活在中国这一广阔疆土上的各民族，都统一于清政权，而清政权必统于皇帝之手。显而易见，清朝的这一新的民族观念，无疑是对“华夷之辨”的否定。

清朝“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在其政治、军事实践中逐渐实现思想观念的时代变革。清人关前，由清太宗皇太极开其端，最先表达了他的民族新观念。其父努尔哈赤在世时，坚持狭隘的本民族至上的民族观念，他对汉人之暴更过于汉



人对夷狄，采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政策[4]，没有被杀的汉人，则被掳掠为奴，有的为满洲王公贵族庄园耕田种地，有的充当家内奴隶。努尔哈赤的民族观念及其政策，使辽东地区的汉人积怨甚深，满汉民族相互仇视，矛盾十分尖锐，局势动荡不定。皇太极即位伊始，就改变其父的民族政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5]十年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满洲、蒙古、汉人，视为一体。”他把三个民族的关系，比做五味，“调剂贵得其宜”，才能“得其和”[6]，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和谐”。民族和谐，国安民安，政权才能稳固。较诸其父，较之从前历代王朝所主“华夷之辨”，皇太极的主张，实属一种新的民族观念。他把这一新观念贯彻于政治实践中，如，广泛吸收汉官、汉将及蒙古王公贵族参加后金政权(清)；不再诛戮汉人，将俘获或招服的大批汉人妥善安置，“编户为民”，恢复被掳为奴的汉人民户地位。皇太极还推出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即扩建八旗组织，他在其父努尔哈赤创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创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并立，构成清朝立国的三大基石。满、蒙、汉八旗制的最后完成，充分体现了皇太极所主满、蒙、汉民族“视为一体”的民族新观念。

皇太极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新变化，因而发展和壮大了清(后金)政权的实力，也为未来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对历代沿袭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的一次突破，因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清朝定鼎北京，君临天下，进入人数以千万计、传统文化极深的汉人社会之中，以世祖为首的满族贵族集团，仍然恪守皇太极的遗策，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世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不断阐述、强调这一思想：“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满汉官民，俱为一家”。[7]这些说法和政策性表述，无一不是对皇太极的“满汉一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继世祖之后，圣祖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将皇太极的民族新观念推上了又一个发展阶段。如果说，世祖的民族新观念主要是针对汉人而发，那么，圣祖的民族观念进一步发展到了长城以外的蒙古族。自九世纪，蒙古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驰骋于长城以北的广阔草原，横扫欧亚大陆，再南下，突破长城，灭金灭南宋，一统天下。立国未足百年，即被明取而代之，其族余部仍散居“三北”，蒙古族是一个强悍而善战的民族，构成了明朝最严重的“边患”。清(后金)建国伊始，就与蒙古展开争战。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对蒙古恩威并用，不断与之联姻结亲，终将其争取过来，成为支撑清朝政权统治的一支巨大力量。如何巩固并长期保持与蒙古民族的联盟关系，不仅关乎“三北”广大地区的安全，更是清朝安危之所系。圣祖决心把蒙古族变为“一家人”，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他采取一项惊人的举措：废长城而不用。他说：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未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友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8]

圣祖下令停止修长城，又道出了他的“中外一家”的思想，“莫道岩关险，要荒总一家。”[9]前已指出，长城是一道阻隔“三北”游牧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的民族分界线，严重障碍国家的统一，并造成民族的对峙，不断引发冲突和战争。圣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长城是靠不住的，只有“修德友民”，才是“邦本”自固的根本之计，因此，圣祖宣布不要土石长城，而要筑成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他说：“朕中外一视，念其人(指蒙古族)皆朕赤子，覆育生成，原无



区别。”[10] 圣祖继承其先辈之策并发扬光大，将蒙古族看成是“一家”之人。清朝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蒙古族彻底降服，从此“三北”不再有蒙古族的“边患”，且蒙古族还成为清朝防卫边疆的重要依靠力量。

圣祖废长城，收蒙古为“一家”，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对千百年来因长城之设而形成的“华夷”观念的空前超越，将民族“大一统”真正发展到长城外的“三北”地区，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光辉一页。

而世宗更将民族“大一统”的观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对圣祖61年的开拓进取做了科学的概括：“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又称：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11]

最有代表性、最能反映世宗对“大一统”理论观念的，是他在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与内阁官员的一次谈话。他说：

“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12)

以上是世宗的著名言论之一，充分显示他对“大一统”的理论阐释，何其深刻、透彻。“中外一家，上下一体”，不可以，“形迹相岐视”，他对历代汉族统治者及士大夫所坚持的传统“华夷观”，给予严厉批判，更显示出他的“民族大一统”论的理论内涵。他痛斥明清之际一些汉族学者：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他针对“夷狄异类，戾如禽兽”的极端说法，痛加驳斥：“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他指出，清朝疆土广远，“中外一家”，“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3]

可以认为，自清太宗发其端，历世祖、圣祖二世，至世宗确已完成了清代“民族大一统”理论的阐发与理论概括，形成一套完整的有别于历代“华夷之辨”的新型民族观。至乾隆年间，乾隆帝在实践上完全贯彻这一新的民族观，把清朝推向鼎盛，最后建成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开创了“中外一家”的空前大一统的时代。

观念的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社会的变革，又推动、深化了人们的观念变革。清朝能实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目标，恰恰是民族观念变革的必然结果。应当指出，与同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思想理论相比，清朝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及其他方面的变革，显然还不具有真正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但从中国历史的变革来衡量，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

[参考文献]

- [1]汉书：卷96“西域”。[M].
- [2]后汉书：卷90“鲜卑传”[M].
- [3]晋书：卷10“刘元海传”[M]
- [4]清太宗实录：卷64[M].
- [5]清太宗实录：卷1[M]
- [6]清太宗实录：卷42[.]
- [7]清世祖实录：卷90[M].
- [8]清圣祖实录：卷151[M].



- [9]御制诗集：初集[M].
[10]清圣祖实录：卷 184(M).
[11]清世宗实录：卷 83(M).
[12]清世宗实录：卷 D0[M].
[13]大义觉迷录[A]. 清史资料：第四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5.

(本文原刊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第162-164页)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3)

【学术快讯】

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在北京大学举行

由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于2006年12月16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正式举行，应邀担任首届主讲人的是费孝通教授的老朋友、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她的讲座主题是“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讲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赵存生教授代表北京大学致辞，社会学系主任马戎教授介绍了“费孝通纪念讲座”的发起并介绍了中根千枝教授的学术成就。北京大学的两百多名师生以及一些校外学者出席了讲座，出席者对中根千枝教授所讲的这一题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讲座过程中不时地对中根千枝教授的精彩讲座报以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后，马戎教授代表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向中根千枝教授赠送了特制的讲座纪念品。

